



旧墨之中有风流

国内名人手迹收藏方兴未艾

“文如其人”进而“知人论世”。通过名人手迹来解读名人,无疑会是一种很好的方式。从去年秋拍起,一些文化名人的手迹便在拍卖场上获得青睐,近期结束的各大春拍,众多名人手迹更是以高价落槌,一股名人手迹的收藏热正悄然兴起。

张充和手迹 从1万追至30万

今年7月举行的西泠春拍中,“近现代名人手迹专场”张充和先生的手迹和她收藏的数十件文人墨迹尤为引人注目,成交价基本达到估价的十多倍。

张充和1913年生人,虽然她多年生活在海外,但随着她先后在苏州和北京举办个人书画展览以及她的题字集《古色今香》等书籍的出版,中国的文化界对她已渐有了解,她是那个时代“闺秀学人”中仅存的硕果。

此次拍卖会上张充和先生的书法作品只有一件,1993年10月下旬,张充和和她的丈夫傅汉思访问凤凰,祭扫沈从文墓,登山临水,缅怀故人,因作《望江南》五首。这是一件绢本小楷作品,词美书妙,可以说是张充和先生的一件代表作,因此为这个专场众多喜爱张充和书法者们所热追,从一万元起拍最终至30万元落槌。

发展规模—— 目前仍属方兴未艾

香港苏富比春拍中,众多名人书法作品以高价落槌,胡适的书法立轴《自提小照》估价5万至7万港元,成交价则达到了122万港元,林语堂的《浮生半日闲》也从4万港元拍到30万港元。而在嘉德春拍中,于右任的138件作品百分之百成交,作品平均单价超过30万元。

国内著名拍卖师刘新惠参与了今年多场春拍会上的名人手迹拍卖,“西泠春拍”的名人手迹拍卖专

场,刘新惠也是见证者之一。他认为,从此次拍卖会所受的关注程度来看,名人手迹的拍卖和收藏,有可能成为国内收藏界的热点,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。原因是,这个领域内受人关注的多为鲁迅、陈寅恪、沈从文这些人耳熟能详的文化名人,而中国历来有着因“文如其人”进而“知人论世”的传统,通过名人手迹来解读名人,无疑会是一种很好的方式。

刘新惠称,中国的名人手迹收藏,目前仍属于方兴未艾的阶段。此类收藏主要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,其一是由于作者生前身后的变故,导致许多手迹未能妥善保存,早已湮没;其二是这些手迹大多由文学艺术联合会这样的专属机构收藏,并未大量进入拍卖市场。刘新惠转而谈道,在西方尤其是欧洲,名人手稿作为一种价值特殊的文献,不仅拥有数量众多的收藏者,也拥有一整套较为成熟的收藏机制,例如举世闻名的爱因斯坦手稿,几乎每一个公式和符号都很好地保存了下来,后人可以从手稿中追溯其天才的智慧和思考的过程。相比之下,国内的名人手迹收藏还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。

刘新惠认为,应当鼓励这些手迹进入拍卖市场和私人收藏领域,以令更多珍贵的文化资源为人们所了解。

价值定位—— 文献意义非比寻常

刘新惠认为,名人手迹在其价值定位上,首先就不同于一般的文化收

藏品。同为手迹,与书法类收藏品相比,这些名人手迹或许并不具有艺术欣赏的价值,却承载了许多名人真实的生命轨迹和其文化学术的进程,因而具有非同寻常的文献意义。

大体上来说,名人手迹按其内容可以分为两类,一类是日常所写的日记、便条,以及朋友家人之间往来的书札信件;以“西泠春拍”拍卖专场上沈从文的书札手稿为例,透过这些颇具生活气息的手迹,后人可以更好地理解沈从文这位文学宗师的性情和人格;而第二类则是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的手稿,无疑,后者的文献价值更为高昂。试想,如果《边城》的手稿也出现在此次拍卖会的话,必然又是另一番光景。

刘新惠提到了不久前陈寅恪手稿的一次拍卖,该批手稿的成交额为数十万元,考虑到名人手稿特殊的文献价值,目前的市场价位仍是不成熟的。刘新惠还认为,国内收藏界很少出现真正价值连城的名作手稿,大多数的相关拍卖品仍属于第一类,文献意义终究有限。在手稿传承的这份艰辛和曲折中,我们还可隐约窥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复杂命运。

值得注意的是,随着名人手迹拍卖价格的走高,鱼目混珠也成了拍卖市场上公开的秘密,投资者需要在市场中练就眼力,可以参考《民国书画大全》、《名人民国书法》等书籍。

(本报综合)

收藏心得

名人手迹,文献价值最珍贵

方继孝

我收藏名人手迹有几个标准,内容必须要有文献价值,这个人要是某个学术领域内非常重要的人物。我收藏的目的,也不光是为了占有,而是为了去考据、研究和著述。

在对所藏名人手迹的研究中,最有成就感的是我根据马衡先生写的一篇为“易案”而作的《附识》撰写的《马衡〈附识〉谈易案》的文章。揭示了马衡在所谓“易培基故宫盗宝案”中的真实想法和做法,澄清了几十年前的史实。

这册马衡于1936年为纪念张元济先生70寿辰所作《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》论文抽印本,是我在旧货市场一书摊上购得的。没想到,马衡于1950年亲笔书写的《附识》就在书

的封三。
《附识》开宗明义就说是为了“易案”而作。“易培基故宫盗宝案”,是当时国民党元,时任司法院副院长张继为泄私愤,与南京地方法院勾结,故意栽赃易培基的一大冤案。这一冤案,致使易培基含冤而死。而马衡却能在易培基最困难的时候,以学术论文的形式为易培基洗冤。

马衡先生的《附识》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,正巧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约我写一本叫《旧墨记》的书,于是我就把马衡的《附识》编进了《旧墨记》中,没想到这篇考据文章得到了不少肯定。马衡先生的长孙马思猛发现了《马衡〈附识〉谈易案》一文后,就通过电

话约我相见,想亲眼看看祖父的论文抽印本。

马思猛非常感谢我对抽印本妥善保存,并写出了考据文章。马思猛先生还把我的这篇文章收录到他写的书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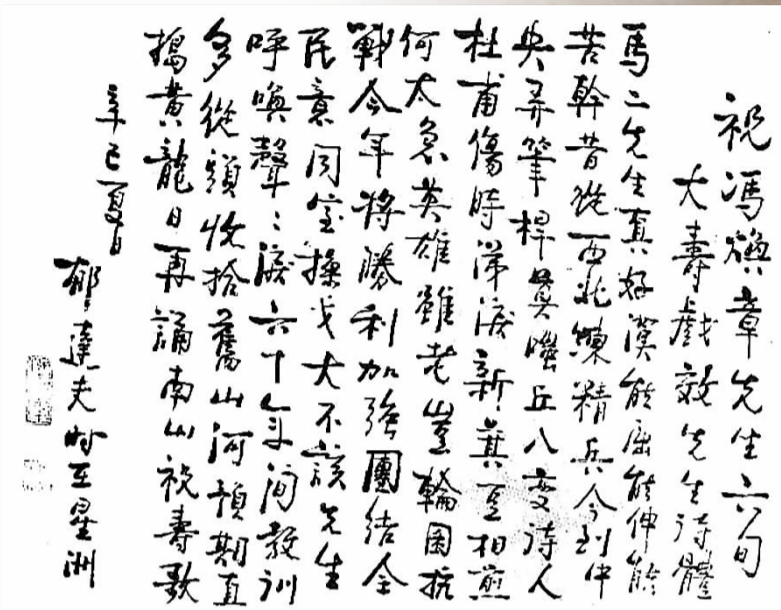
我看重的还有一份是中国文字改革的资料。上世纪50年代,中国文字要进行简化,当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将第一次简化字的表格,还有将简化的偏旁部首发给所有学术界的人,让他们提意见。而其中学术界知名人士提出意见的手稿有一部分被我收藏。

关于这部分手稿的“出来”,周有光当时就发出遗憾:这批资料流失太可惜了。当时教育部大楼拆迁,文字改革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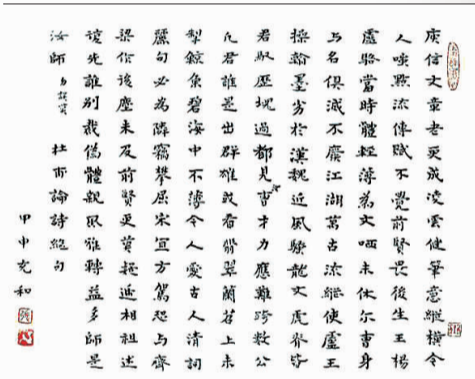
员会认为是过期档案,将其扔出来了。扔出几口袋以后,被小贩拉走了。小贩刚刚拉走,周有光先生正好到文字改革委员会去,一看是当时的资料,就说不能卖。

我在旧书市场看到这批资料,一看都是当时专家对文字改革提建议的原始资料。类似老舍在文稿上就“马”字的简化发表自己的看法;郭沫若则对拟简化的“鱼”字提出了建议。他对文改会提出的三个简化的“鱼”字都不同意,提出了自己的方案。现在我们使用的简化“鱼”字,就是郭老提出的方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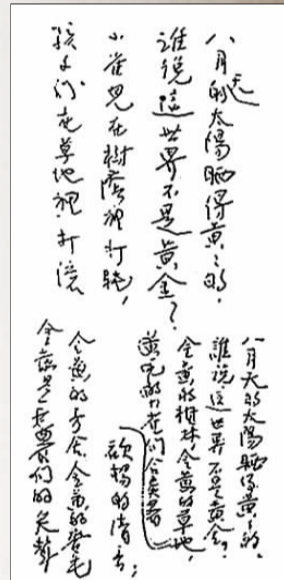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我收藏的名人信札数以千计,这是起步早的优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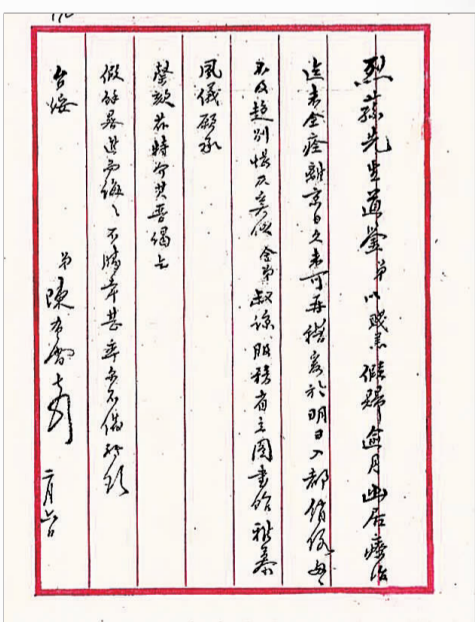
▲郁达夫手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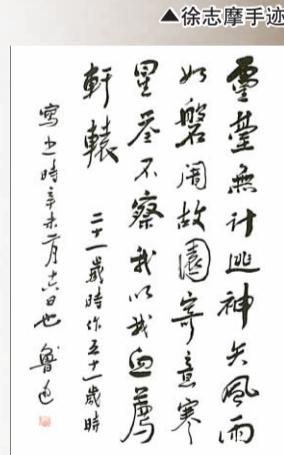
▲张充和手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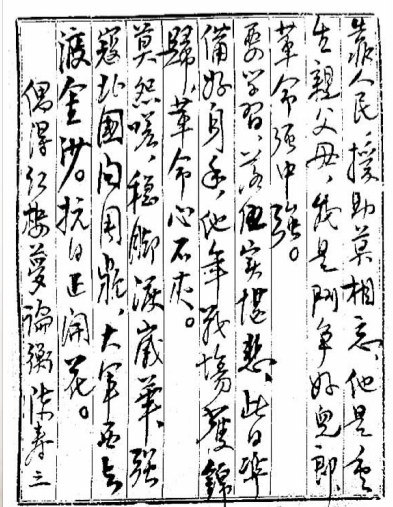
▲徐志摩手迹



▲陈布雷手迹



▲鲁迅手迹



▲陈毅手迹